

· 海外文摘 ·

人口问题归根结蒂是发展问题

——访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地域构造研究室室长若林敬子

日本《留学生新闻》记者 夏 冰

记者: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引起的争议最大,而且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列为中国人权状况不佳的典型事例,您作为一名外国学者,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?

若林:中国是世界上头号人口超大国,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,而是世界人口问题中的一个问题。从这个观点出发,中国能有效地抑制人口增长,是对世界的贡献,是理应给予肯定的。至于“人权”,我认为人权观是多元的,按西方的观点来衡量是侵犯人权的制度或行为,按东方人的观点就不一定是。人权观是价值观的产物,西方人从基督教的理念出发,认为胎儿在母体当中已具有生命,人工流产被理解成扼杀生命,这是胎儿中心的观点;我们东亚的儒家文化圈,无论是日本、中国、韩国,认为胎儿出生之后才具有生命,与西方相比,东方人更重视母体的健康,持母体中心的观点。换言之,母亲对于出产的决定权较西方要大得多。由此可见,因东西方在人权上的基本观念存在分歧,西方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异议就不足为奇了。我想,在世界性的人口膨胀当中,中国如果遵从西方的人权观念,不实行抑制人口数量的措施的话,那么后果简直不堪设想,而且中国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的成果,的确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。我已经把这些看法贯穿于我的书中。

记者:世界人口大国中仅次于中国就是印度。印度政府曾经提出“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”的口号。您怎样看待印度的人口抑制政策呢?

若林:印度总人口在1992年是8亿8200万人,年平均增长率是2.1%。今后35年间的年增长率将有可能持续为1.5%。而中国目前的年增长率为1.4%,

今后有可能下降为0.8%。由于这种差异,联合国甚至预测到2035年前后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。其实,印度政府曾在1976年4月公布了“国家新人口政策”,各邦对强制避孕手术制订了相应的法规,但这种强制性的政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,招致国民对英迪拉·甘地为首的执政党的不满。第二年,随着执政党在大选中惨败,人口政策也以失败而告终。虽然后来英·甘地重掌大权,但再也没有实行强制性的政策,使印度的人口膨胀达到空前的规模。按这样的状态推测,印度人口高峰期将达到20亿,而中国至多是15.16亿。人口膨胀必然会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,阻碍社会的发展,使“摆脱贫困”成为一句空话。

记者:全世界10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中有6个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。亚洲国家中实行得较成功的是中国和泰国,泰国妇女人均生育子女的人数在1960年到1994年的24年里从6.4人下降到2.2人,孟加拉妇女的人均生育数则从7人下降到4.2人,为什么同属亚洲国家的印度,实行人口抑制政策的结果会迥然不同呢?

若林:印度的人口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既科学又合理,但难关在于印度国民普遍信仰印度教,在他们看来,那是对他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命信仰的亵渎,这种生命观正是有着数千年积淀的印度教的文化根源。可是,印度政府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一文化因素,而推行自上而下的“不生孩子”运动,结果很多人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加以抵制。印度人口政策的失败对全世界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。

(摘自日本《留学生新闻》1995年4月)